

比較視野下的修辭思維： 余光中論現代中文的歐化現象

高大威

摘要

胡適當初期待的「文學的國語」，絕對不是這個樣子。

——余光中¹

五四新文學運動使得中文的主流由文言變成了語體，這是一個新範式的出現，由於稚嫩，當時許多作家、學者紛紛在書寫上進行不同的嘗試，並乞靈於西方的表達方式，不論有意、無意，也無論或良或窳，「歐化／西化」的痕跡普遍見諸現代中文。余光中既是教師，又是作家，既諳中文，復曉英文，並曾從事翻譯，他數十年對現代中文的親歷與討論乃是出自中、英文的比較視野，有別於本位主義的立場。本文試藉著余光中的論述與實踐，勾勒其對現代中文及其歐化現象的觀察與評論。此外，本文發現其早年遣詞行文明顯與其後觀念相悖的狀況，換言之，他後來的見解是在一動態思考與實踐歷程中形成的，這種種摸索，對現代中文的走向具有重要的參鑑意義。

關鍵詞：余光中、中文、歐化、西化、翻譯體

2013/09/30 收稿，2013/12/12 審查通過，2014/02/15 修訂稿收件。

* 高大威現職為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教授。

** 本文為國科會計畫案 98-2410-H-260-056-MY3 的部分研究成果，特為致謝。

¹ 余光中 Yu Kuangchung：〈白而不化的白話文〉“Bai er buhua de baihuawen”，見其《從徐霞客到梵谷》*Cong Xu Xiake dao Fangu*（臺北[Taipei]：九歌[Jiuge]，1994年），頁283。按：余光中先生姓名之英文多採威式拼法，故本文沿用，以示尊重，此感謝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外國語文學系魏伯特（Robert Reynolds）教授賜告。

Rhetorical Modes of Thought from th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Yu Kuang-chung On the Europeanization of Modern Chinese

Gao Da-wei

Abstract

As a result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Chinese literature began to be written in vernacular Chinese rather than classical Chinese. Thus during this period there was a shift in the stylistic paradigm of where scholars and writers began to be eager to experiment with different writing styles, and often seeking inspiration from foreign languages. In doing so, a refreshing new way of literary expression was developed. No matter if the literati originally intend to westernize Chinese or not, the Europeanizing (Westernizing) of the written vernacular Chinese still occurred. This westernizing of the vernacular Chinese produced a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with a mixed quality. Professor Yu Kuang-chung is both an educator and writer, learned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who has experience in translating between the two languages. His decades of experience in the comparison of modern Chinese and English literature, has helped him for a perspective which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usual parochial views.

This paper aims to scrutinize Professor Yu's Views and evaluation of Europeanization in modern Chinese by examining his own theoretical writings and how he puts them into practice. It turns out that what Professor Yu did in his earlier years was often contrary to his later works. This shows his later views were gradually formed through retrospective thought and practice. In this regard, his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endeavors and efforts have become a significant point of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Keywords: Yu Kuang-chung, Chinese, Europeanization, westernization,
Translationese

一、引論

余光中在語文方面的專業表現，主要體現在三方面：一是英文本業，他出身外文系，學的是英文，後來教的也是英文；一是中文創作，他創作了大量的現代詩以及散文；一是翻譯，這正是前兩者的跨界工作，對認真翻譯的人來說，容易產生跨語種的比較視野。²此外，他曾在香港中文大學擔任教職，特別的是，在臺灣，他任教於外文系，在香港則任教於中文系。總之，他兼具中、英兩種語文素養，而且常常出將兩者對照，這往往對特定語種的語感及其表達方式有較深的反思——就余光中來說，這裡所指涉的特定語種即是中文，³因為中文是他的母語，而他在創作時，也都是以中文構思、書寫，至於在從事多本著作的翻譯時，中文則是他的「目標語言」。⁴

余光中出生於 1928 年，從進入臺灣大學外文系讀書以及開始筆耕，迄今已逾一甲子，在這麼長的歷程中，他對語文所抱持的觀念和具體的表現會有異同，自然無足為奇，而值得檢視的是：他關注的重點何在？其中的「變」與「不變」，各是什麼？為什麼？他在耄耋之齡擔任了「搶救國文教育聯盟」的發起人，他撰寫的〈在外語與方言之間〉成了該聯盟的「行動宣言」，⁵他的訴求是什麼？本文與其他研究一樣，並不在價值判斷上有任何預設，換言之，不會先入為主，視余光中所思所言所寫為金科玉律，或是或非，皆賴論證，不過，以余光中沈浸於中文既深且久的專業資歷而言，

² 他說：「英文與中文仍有許多基本的差異，無法十分融洽。這一點，凡有中英文互譯經驗的人，想必都能同意。其實，研究翻譯就等於研究比較語言學。」見余光中 Yu Kuangchung：〈中文的常態與變態〉“Zhongwen de changtai yu biantai”，見其《從徐霞客到梵谷》*Cong Xu Xieke dao Fangu*，頁 269。又，他在〈創作與翻譯〉一文也提及：若深究翻譯，常在兩種語言間排難解紛，消異求同，等於也研究比較語言學了，此見其《舉杯向天笑》*Jubei xiang tian xiao*（臺北[Taipei]：九歌 [Jiuge]，2008 年），頁 109-110。

³ 本文所稱「中文」，意義皆等同廣義的漢語，包括了口說與書寫，為求統一，論述時概用「中文」。

⁴ 「目標語言」即 target language，余光中譯成「受語」，參〈作者，學者，譯者〉“Zuozhe, xuezhe, yizhe”一文，見其《藍墨水的下游》*Lan moshui de xiayou*，頁 34-35；另可參〈創作與翻譯〉“Chuangzuo yu fanyi”，見其《舉杯向天笑》*Jubei xiang tian xiao*，頁 100-101。

⁵ 見余光中 Yu Kuangchung 〈在外語與方言之間〉“Zai waiyu yu fangyan zhijian”一文，收錄於李素真 Li Suzhen 主編：《自豪與自幸——二十堂名家的國文課》*Zihao yu zixing: ershi tang mingjia de guowen ke*（臺北[Taipei]：商周出版 [Shang zhou chuban]，2005 年），頁 2-5。

他在這方面的思考與實踐軌跡，客觀而言，對當代中文教育確具重要的參照意義。

二、論五四新文學傳統與中文歐化

無論是從語文層次還是文學層次探討現代中文，余光中每每論及五四新文學運動，這並沒有什麼特殊，現代中文的里程碑無疑奠於五四時期。五四揭櫫以白話代替文言，如果所謂「代替」非指徹底消滅，而是指書寫的主流語體由文言變成了白話，那麼，這場革命無疑大獲成功了，但是，典範轉移後，什麼樣的白話——亦即什麼樣的現代中文才值得追求？五四開啟了對現代語體不斷摸索、嘗試的過程，然而文言為主流的時代終結了，必須立刻以新的範式取而代之，對學校教育所依憑的國文教科書，其需求更為迫切，因此，徐志摩、朱自清一輩的作品標舉了出來，除了左傾乃至投共的作家之外，其影響一直延伸到 1949 國民政府遷臺後的三十年。余光中揭開了一個多數人沒有留意到的狀況：民初作家寫出「範文」的時候，多半很年輕，如：朱自清寫〈槳聲燈影的秦淮河〉時二十五歲，同遊的俞平伯寫同題的遊記，當時二十四歲，朱自清寫〈荷塘月色〉時二十七歲，冰心寫〈山中雜記〉、〈寄給母親〉時，二十四歲，徐志摩寫〈我所知道的康橋〉時年紀稍長，也只有三十歲，郁達夫的小說《沈淪》、聞一多的詩〈死水〉也分別是二十五、二十七歲時的作品，⁶但是，余光中指出：

半個世紀以來，盤據在教科書、散文選、新文學史，被容易滿足的人奉為經典之作模範之文，一讚而再讚的，是二十年代幾篇未盡成熟，甚至頗為青澀的「少作」。……一直到現在，還不肯斷五四的奶。⁷

換言之，他認為因為把這些作家的「少作」奉為典範，以致久久未能超越五四，透過教育和媒體愈使其幽靈盤桓不去，因此現代中文出現了「繁硬文體」，他說：

⁶ 余光中 Yu Kuangchung：〈白而不化的白話文〉“Bai er buhua de baihuawen”，見其《從徐霞客到梵谷》*Cong Xu Xiake dao Fangu*，頁 267-268。

⁷ 同上註，頁 267。

白話文運動推行了六十年的結果，竟然培養出這麼可怕的繁硬文體，可見不但所謂封建的文言會出毛病，即連革命的白話也會毛病百出，而愈是大眾傳播的時代，愈是如此。⁸

他對現代中文的什麼地方感到不滿？他舉的例子，可分為兩方面：一是內容濫情，他舉了朱自清名作〈匆匆〉中的兩段，因作品內容不是本文討論的重點，為省篇幅，不錄其原文，這形成了後來所謂的「新文藝腔」；⁹另一屬於語文形式方面的現象，余光中指的是經常出現「不順」、「不妥」、「不通」的句子，¹⁰這在陳望道的歸類，屬於「消極修辭」的範疇，¹¹而這正是五四迄今，中文書寫最為人詬病之處，而且是當代普遍的問題。余光中學的仍是朱自清的作品，針對其中生硬晦澀的句子——

但一箇平常的人像我的，誰願憑了理性之力去醜化未來呢？我寧願自己騙著了。不過我的社會感性是很敏銳的；我的思力能拆穿道德律的西洋鏡，而我的感情卻終於被牠壓服著……在眾目睽睽之下，這兩種思想在我心裡最為旺盛。她們暫時壓倒了我的聽歌的盼望，這便成了我的灰色的拒絕。¹²

這是什麼導致的？余光中認為是「西化」——亦即五四以來所稱的「歐化」，指受到英文語法影響下的中文表現，這種毛病不限於朱自清一人，而是許多民初作家普遍的狀況。余光中在多篇文章中都提及這個問題，具體說來，如：愛用代名詞，中文也用代名詞，但相對英文而言，常常省略，此在語法上又稱為「零代詞」，無论文言、白話，中文原本運用得很靈活，但有時

⁸ 余光中 Yu Kuangchung：〈白而不化的白話文〉“Bai er buhua de baihuawen”，見其《從徐霞客到梵谷》*Cong Xu Xiake dao Fangu*，頁 283。

⁹ 余光中在〈評戴望舒的詩〉裡對「新文藝腔」的說法是：「就是甘受洋罪的一種文體，看起來是中文，聽起來卻是西語，真是不中不西的畸嬰。」見其《青青邊愁》*Qingqing bianchou*（臺北[Taipei]：九歌[Jiuge]，2010年），頁 184。

¹⁰ 余光中 Yu Kuangchung：〈白而不化的白話文〉“Bai er buhua de baihuawen”，見其《從徐霞客到梵谷》*Cong Xu Xiake dao Fangu*，頁 270-271。

¹¹ 陳望道 Chen Wangdao 說：「消極手法是以明白精確為主的，對於語詞常以意義為主，力求所表現的意義不另含其他意義，又不為其他意義所淆亂。但求適用，不計華質和巧拙。」見其《修辭學發凡》*Xiucixue fajan*（上海[Shanghai]：上海教育出版社[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2006年），頁 4。

¹² 余光中 Yu Kuangchung：〈白而不化的白話文〉“Bai er buhua de baihuawen”，見其《從徐霞客到梵谷》*Cong Xu Xiake dao Fangu*，頁 270。

作家受英文影響，故意逐一列出，反而冗贅而不自然。又如：濫用虛字，余光中認為五四以來「為害最大的虛字，便是出現得最頻的那個『的』字」，他舉了〈荷塘月色〉中的例子：

月光是隔了樹照過來的，高處叢生的灌木，落下參差的斑駁的黑影，峭楞楞如鬼一般；彎彎的楊柳的稀疏的情影，卻又像是畫在荷葉上。

余光中進一步指出換了今日臺灣、香港比較有心的作家，可能改成：

月光隔樹照過來，高處叢生的灌木，落下參差而斑駁的黑影，峭楞楞如鬼一般；楊柳彎彎，稀疏的情影卻又像畫在荷葉上。¹³

兩相對照，改作明顯清順得多，這來自余光中的中文基本素養。濫用「的」字，余光中另寫過一篇專論——〈論的的不休〉。¹⁴

余光中認為二十年代的作家「中文根柢仍厚，西化之病只在皮毛……」。到了三十年代，像何其芳筆下的西化，就已經危及句法、語法，和思考方式了，¹⁵他又指出艾青的作品是另一個惡性西化的顯例，余光中摘出艾青為《戴望舒詩選》所寫序言的片段——

這個時期的作品，雖然那種個人的狹窄的感情的詠歎，依舊佔有最大的篇幅，但調子卻比過去明朗，較多地採用現代的日常口語，給人帶來了清新的感覺……不幸這種努力並沒有持續多久，他又很快地回到一個思想上紊亂的境地，越來越深地走進了虛無主義，對自己的才能作了無益的消耗……詩人在敵人的佔領的區域過著災難的歲月。他吞嚥著沈哀地過著日子，懷念著戰鬥的祖國。¹⁶

余光中引完前段文字後，說：「艾青的西化不但在皮毛，更深入了筋骨。前引的句子沒有一句是清純道地的中文，好像作者只讀過翻譯的書，根本沒

¹³ 余光中 Yu Kuangchung：〈白而不化的白話文〉“Bai er buhua de baihuawen”，見其《從徐霞客到梵谷》*Cong Xu Xiake dao Fangu*，頁 272-273、頁 276-277。

¹⁴ 參余光中 Yu Kuangchung：〈論的的不休〉“Lun de de bu xiu”（原是中文大學「翻譯學術會議」主題演說文字），見其《藍墨水的下游》*Lan moshui de xiayou*（臺北[Taipei]：九歌 [Jiuge]，1998 年），頁 69-94。

¹⁵ 余光中 Yu Kuangchung：〈白而不化的白話文〉“Bai er buhua de baihuawen”，見其《從徐霞客到梵谷》*Cong Xu Xiake dao Fangu*，頁 278-279。

¹⁶ 同上註，頁 278-279。

接觸過古典文學。」分析完後，他又抽檢了曹禹《日出》的跋語，亦不乏生硬不順之病。¹⁷他認為寫出這種中文，是因為當時唾棄文言遺產，與古典之間出現了斷裂，真正讀通而能消化英文的文人又少，至於白話，既然無法上溯《紅樓夢》、《西遊記》、《水滸傳》，「只能乞援於五四以後的單薄成就，和一些不太可讀的翻譯」。¹⁸簡言之，既已拒絕了古典文學的養分，當時的作家只能從五四以來另起爐灶的青澀成品中找出路，而所謂「不太可讀的翻譯」，與「五四以後的單薄成就」其實互為影響，中文歐化主要來自翻譯（英翻中），許多人不滿中國傳統或文言形式，因此抵制「縱的繼承」而主張「橫的移植」，¹⁹這無異於取法英文以改造中文，使相對純粹的中文邊緣化了，而翻譯體或模擬的「翻譯腔」盛行，至於真正的翻譯，目標語言的表現往往也成了中文的歐化，這種狀況近似第二語言學習者或外語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所產生的「中介語」（interlanguage），是一種混血的表達方式。余光中寫了〈中文的常態與變態〉討論這個問題，該文起始即說：

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七十年間，中文的變化極大。一方面，優秀的作家與學者筆下的白話文愈寫愈成熟，無論表情達意或是分析事理，都能運用自如。另一方面，道地的中文，包括文言文

¹⁷ 余光中 Yu Kuangchung：〈白而不化的白話文〉“Bai er buhua de baihuawen”，見其《從徐霞客到梵谷》*Cong Xu Xiake dao Fangu*，頁 279。在〈早期作家筆下的西化中文〉，余光中也嚴厲批評了艾青「西而不化」的表現；此外，周作人、沈從文、何其芳等作品中的某些表現也受到詬病，見其《分水嶺上》*Fenshuiling shang*（臺北[Taipei]：九歌[Jiuge]，2009 年），頁 137-145。

¹⁸ 余光中 Yu Kuangchung：〈白而不化的白話文〉“Bai er buhua de baihuawen”，見其《從徐霞客到梵谷》*Cong Xu Xiake dao Fangu*，頁 282。

¹⁹ 臺灣在民國 40 年代由紀弦針對新詩創作提出六條「現代派的信條」，其中有「新詩乃橫的移植，而非縱的繼承」，後來余光中等人反對「橫的移植」，認為仍要延續傳統，論者將此視為「現代詩社」與「藍星詩社」在立場上的主要差異。然而，「橫的移植，而非縱的繼承」的類似概念早自五四即已產生，而且不限文類，甚至是某些人全方位的文化主張。從余光中對現代詩社的不同意見，正可推知他對語文、文學、文化的基本思維與態度。余光中二十三歲時出版《舟子的悲歌》，梁實秋為這本書寫的書評裡說：「我們寫新詩，用的是中國文字，舊詩的技巧是一分必不可少的文學遺產，同時新詩是一個突然出生的東西，無依無靠，沒有軌跡可循，外國詩正是一個最好的借鏡。」余光中在 1987 年回顧這段往事，說：「……他所提示的上承傳統旁汲西洋，卻是我日後遵循的綜合路線。」語出〈文章與前額並高〉“Wenzhang yu qianebinggao”，見其《隔水呼渡》*Geshui hu du*（臺北[Taipei]：九歌[Jiuge]，2000 年），頁 264；他所濃縮的「上承傳統，旁汲西洋」八個字，正可說明他一貫的態度。

與民間文學的白話文，和我們的關係日漸生疏，而英文的影響，無論來自直接的學習或是間接的潛移默化，則日漸顯著，因此一般人筆下的白話文，西化的病態日漸嚴重。一般人從大眾傳媒學到的，不僅是流行的觀念，還有那些觀念賴以包裝的種種說法；有時，那些說法連高明之士也抗拒不了。²⁰

他認為不同地區使用的中文雖然差異互見，共同的趨勢則是「繁瑣與生硬」——「化簡為繁，以拙代巧」，這是「西化」所致，他視此為「中文的一大危機」，而對治之道即是順著中文的生態而不要破壞，他說：

中文也有生態嗎？當然有。措詞簡潔、語法對稱、句式靈活、聲調鏗鏘、這些都是中文生命的常態。能順著這樣的生態，就能長保中文的健康。要是處處違拗這樣的生態，久而久之，中文就會污染而淤塞，危機日漸迫近。²¹

他在這篇長文中，特別澄清了兩方面的疑慮：

(一) 「語言是活的，有如河流，不能阻其前進，所謂西化乃必然趨勢」。²²

余光中回應：「語言誠然是活的，但應該活得健康，不應帶病延年。至於河流的比喻，也不能忘了兩岸，否則氾濫也會成災。西化的趨勢當然也無可避免，但不宜太快、太甚，應該截長補短，而非以短害長。」這都是概念上的討論，重點在：余光中接受語言有其自身的生命，但也強調生命有「病」與「不病」之別；而尊重語言自然流動的同時，不能完全放任以致造成極大的負面效應；至於西化，不否定其為趨勢，但要與中文「截長補短」，不宜良窳不分而逕以西化為準則。

(二) 「頗有前衛作家不以杞人之憂為然，認為堅持中文的常規，會妨礙作家的創新」。余光中申說：「……強調中文的生態，原為一般寫作

²⁰ 余光中 Yu Kuangchung:〈中文的常態與變態〉“Zhongwen de changtai yu biantai”，見其《從徐霞客到梵谷》*Cong Xu Xiake dao Fangu*，頁 237。余光中說的「有時，那些說法連高明之士也抗拒不了」，例子不勝枚舉，在中文系所師生的論文中，起首常見一節的標目是「問題的提出」，即是顯例，類似的概念用已有的措詞「緣起」或「研究緣起」即可，然而生硬的說法卻取而代之了。

²¹ 同上註，頁 238。

²² 余光中對「語言是活的」云云的態度，除了見諸〈中文的常態與變態〉“Zhongwen de changtai yu biantai”外，在他的〈從西而不化到西而化之〉“*Cong xierbuhua dao xierhuazhi*”一文中也有發揮，見其《分水嶺上》*Fenshuiling shang*，頁 167。

說法，無意規範文學的創作。前衛作家大可放心去追逐繆思，不用礙手礙腳，作語法之奴。」這是將書寫大致劃分為「語文日用」與「文學創作」兩個層次，分別對待，前者守常而後者達變。他並補充：「誰要是不知常態為何物而貿然自詡為求變，其結果也許只是獻拙，而非生巧。變化之妙，要有常態襯托才顯得出來。一旦常態不存，餘下的只是亂，不是變了。」²³余光中其實是期望在非屬文學創新的範圍中保護中文的生態，確保中文在美感上的基本品質。

三、評析中文歐化

余光中對現代中文的反思與評論，與他從事翻譯有關，他在 1967 年發表的〈中西文學之比較〉以及在 1969 年發表的〈翻譯和創作〉都出自翻譯——或者說「對比語言」的角度。²⁴他說：

中國文學的特質，在面臨翻譯的時候，最容易顯現出來。翻譯實在是比較文學的一個有效工具，因為譯者必須兼顧兩種文學的對照性的特質。²⁵

余光中這兩篇文章側重文學作品在翻譯過程牽涉的實際問題，他舉的例子來自詩文，而非日常書寫，亦即針對文學層次而非狹義的語文層次。但是，文學既是語言的藝術，畢竟無法避開語文層次的討論。在〈中西文學之比較〉，余光中說：

中國文字在文法上彈性非常之大，不像西方的文法，好處固然是思考慎密，缺點也就在過份繁瑣。中文絕少因文法而引起的字形變化，可以說是 inflection-free 或者 non-inflectional。中文的文法中，沒有西方文字在數量 (number)，時態 (tense)，語態 (voice)，

²³ 以上兩項所引，俱見余光中 Yu Kuangchung：〈中文的常態與變態〉“Zhongwen de changtai yu biantai”，見其《從徐霞客到梵谷》*Cong Xu Xiake dao Fangu*，頁 264。

²⁴ 〈中西文學之比較〉“Zhongxi wenxue zhi bijiao”一文，見余光中 Yu Kuangchung：《望鄉的牧神》*Wangxiang de mushen*（臺北[Taipei]：純文學[Chunwenxue]，1975 年），頁 205-223；〈翻譯和創作〉“Fanyi he chuanguo”一文，見余光中 Yu Kuangchung：《焚鶴人》*Fenhe ren*（臺北[Taipei]：純文學[Chunwenxue]，1981 年），頁 115-136。

²⁵ 余光中 Yu Kuangchung：〈中西文學之比較〉“Zhongxi wenxue zhi bijiao”，見其《望鄉的牧神》*Wangxiang de mushen*，頁 217。

和性別 (gender) 各方面的字型變化，……單音的中文字，在變換詞性的時候，並不需要改變字形。²⁶

同一篇文章，余光中提到的還有：「英文文法中不可或缺的主詞與動詞，在中國古典詩中，往往可以省去。」省略部分，還提及了前置詞、連接詞以及（受格與所有格的）代名詞。²⁷在〈翻譯和創作〉一文，余光中說：「以英文譯中文為例，兩種文字在形、音、文法、修辭、思考習慣、美感經驗、文化背景上既如此相異，字、詞、句之間就很少現成的對譯法則可循。」²⁸這在今天的翻譯界，既是共識，也是常識；這篇文章值得特別關注的是「譯文體」的公式化，他說：

……譯詩在一切翻譯之中，原是最高的一層境界，我們何忍苛求。我要追究的，毋寧是散文的翻譯，因為在目前的文壇上，惡劣的散文翻譯正在腐蝕散文的創作，如果有心人不及時加以當頭棒喝，則終有一天，這種非驢非馬不中不西的「譯文體」，真會淹沒了優美的中文！這種譯文體最大的毛病，是公式化，也就是說，這類的譯者相信，甲文字中的某字或某詞，在乙文字中恆有天造地設恰巧等在那裡的一個「全等語」。²⁹

這段話有兩個重點：一、惡劣的散文翻譯——不中不西的「譯文體」會影響創作而腐蝕優美的中文。客觀言之，他所憂心的已成了普遍的事實，影響所及，不僅在散文創作，更在語文層次的一般書寫；二、翻譯時，將粗糙的對應語予以公式化，結果是為了表達上求簡易、方便而犧牲了語文的精緻。透過這種翻譯，無論是學校英文課文還是課外小說、報刊，接觸既頻繁，習染之下，確實容易出現余光中所言：「英文沒有學好，中文卻學壞

²⁶ 余光中 Yu Kuangchung：《望鄉的牧神》*Wangxiang de mushen*，頁 213。文中，余光中引了許多實例，為避免枝蔓，本文不一一引述。

²⁷ 同上註，頁 214、215。該文除了語法，也比較了中文和英文在聲調、節奏等相異之處，其距本文論旨稍遠，故不一併探討。

²⁸ 余光中 Yu Kuangchung：〈翻譯和創作〉“Fanyi he chuanguo”，見其《焚鶴人》*Fenhe ren*，頁 124。

²⁹ 同上註，頁 127。又，余光中所稱「譯文體」，即 *traslationese*，他在〈翻譯之為文體中，謂之「今日中文的變體」，並指其是文言文、白話文、舊小說文體外的「第四文體」，見其《舉杯向天笑》*Jubei xiang tian xiao*，頁 144。

了，或者可以說，帶壞了。」³⁰簡言之，這指涉的正是中文的惡性歐化現象，而余光中乃是從他自身的翻譯經驗出發，進以反思劣質譯文及其在翻譯之外產生的普遍影響。

「歐化」一詞及其概念，早在五四時期即已出現，而且當時魯迅、傅斯年、朱自清等都曾特別討論過與歐化相關的議題。余光中對此，有時沿用「歐化」一詞，有時則稱為「西化」，兩名的命義則無不同。早在 1963 年寫的〈剪掉散文的辮子〉裡，他說：「現代散文當然以現代人的口語為節奏的基礎。但是，只要不是洋學者生澀的翻譯腔，它可以斟酌採用一些歐化的句法，使句法活潑些，新穎些……。」³¹足徵他並不完全排斥歐化。1975 年，在〈評戴望舒的詩〉一文，他說道：「儘管戴詩也詠及踏葉聽角之類的秋興，但全詩予人的感覺仍是帶點歐化的。主要的原因仍在語言。」³²從這段話的語意來看，對戴詩的「歐化」不無遺憾，那麼，這裡的「歐化」一詞自屬負面含意。總括來說，余光中認為歐化的狀況好壞兼具，不能一概而論，他批評朱自清對中文歐化樂觀而姑息的態度，認為這是不幸，並質疑魯迅認定歐化能帶來「精密」的效用，³³余光中進一步說：

所謂歐化也有善性惡性之分。「善性歐化」在高手筆下，或許能增加中文的彈性，但是「惡性歐化」是必然會損害中文的。「善性歐化」是歐而化之，「惡性歐化」是歐而不化。這層利害關係，

³⁰ 余光中 Yu Kuangchung:〈中文的常態與變態〉“Zhongwen de changtai yu biantai”，見其《從徐霞客到梵谷》*Cong Xu Xiake dao Fangu*，頁 239。余光中在〈哀中文之式微〉中也說：「報上常見的『翻譯體』，往往是文言詞彙西化語法組成的一種混血文體，不但行於譯文，更且傳染了社論及一般文章。……一般讀者天天看這樣的中文，習以為常，怎能不受感染呢？」又說：「如果教育制度和大眾傳播的方式任其發展，中文的式微是永無止境，萬劫難復的。」見其《青青邊愁》*Qingqing bian chou*，頁 92-93；〈哀中文之式微〉一文寫於 1976 年，當時無法想像今天大眾對手機通訊與網際網路的仰賴，這種人人可以即時、隨地參與的新媒介雖屬中性，但對語文習慣或良或劣的推波助瀾作用則遠遠勝過傳統的載體。

³¹ 余光中 Yu Kuangchung:〈剪掉散文的辮子〉“Jiandiao sanwen de bianzi”，見其《逍遙遊》*Xiao yao you*（臺北[Taipei]：大林出版社[Dalin chubanshe]，1982 年），頁 36。

³² 余光中 Yu Kuangchung:〈評戴望舒的詩〉“Ping Dai Wangshu de shi”，見其《青青邊愁》*Qingqing bian chou*，頁 187；在同一篇文章中，余光中並批評戴望舒的〈獄中題壁〉「仍未能完全擺脫歐化，民族感也未能充分發揮」，頁 191。

³³ 余光中駁斥英文比較「精密」，認為那是一種「幻覺」的說法，並可參〈從西而不化到西而化之〉“Cong xierbuhua dao xierhuazhi”，見其《分水嶺上》*Fenshuiling shang*，頁 149、153。

早期新文學作家，包括朱自清，都很少仔細分辨。到了艾青，「惡性歐化」之病已經很深。³⁴

歐化固分善性、惡性，但余光中多篇文章提到歐化時，指的多是惡性歐化，而論及善性歐化的比例遠遠不及，他在〈撐起，善繼的傘季〉裡說：「方思的文體和句法，頗有一點翻譯的味道，但是『洋』得很好。痾弦的也是一樣，但更口語化。施善繼……，由於甚少使用文言與中國古典背景，更饒有翻譯的趣味，當然，我是指相當雅潔的翻譯。」在同一篇文章後面，他批評施善繼寫的「遮陽傘般」、「被濾過後」是「令人難以卒讀」的歐化語法。³⁵余光中在另一篇文章——〈徐志摩詩小論〉中肯定了徐志摩作品的歐化之處，如他認為「較西化」的〈偶然〉最後四句：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記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這交會時互放的光亮！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一句，余光中認為：「歐化得十分顯明，卻也頗為成功……。如果堅持中國文法，改成『你有你的方向，我有我的方向』，反而囉唆無趣了。」再者，針對同樣四句的雙動詞合用受詞，他說：「在篇末短短的四行詩中，雙動詞合用受詞的歐化句法，竟然連用了兩次，不但沒有失誤，而且頗能創新，此之謂『歐而化之』。」³⁶這是余光中對歐化作品的肯定，他並說：

論者常說徐志摩歐化，似乎一犯歐化，便落了下乘。其實徐志摩並不怎麼歐化，即使真有歐化，也有時歐化得相當高明。他的詩在格律上，句法上，取材上，是相當歐化的，但在詞藻和情調上，仍深具中國風味。其實五四以來較有成就的新詩人，或多或少，

³⁴ 余光中 Yu Kuangchung：〈論朱自清的散文〉“Lun Zhu Ziqing de sanwen”，見其《青青邊愁》*Qingqing bian chou*，頁 243。

³⁵ 余光中 Yu Kuangchung：〈撐起，善繼的傘季〉“Cheng qi, shanji de sanji”，見其《焚鶴人》*Fenhe ren*，頁 147、159。

³⁶ 余光中 Yu Kuangchung：〈徐志摩詩小論〉“Xu Zhimo shi xiaolun”，見其《分水嶺上》*Fenshuiling shang*，頁 15-16；余光中對徐志摩詩作歐化的情形，有褒有貶，詳同書，頁 13-14。

莫不受到西洋文學的影響；影響不在有無歐化，而在歐化得是否成功，是否真能豐富中國文學的表現手法。歐化得生動自然，控制有方，採彼之長，以役於我，應該視為「歐而化之」。歐化得拙笨勉強，控制無力，不但未能採人之長，反而有損中文之美，便是「歐而不化」。新文學作家中文的毛病，一半便由於「歐而不化」……。³⁷

在〈從西而不化到西而化之〉一文裡，余光中也分別舉了張愛玲的〈傾城之戀〉與錢鍾書〈談教訓〉的例子，稱讚其為「善性西化」。³⁸

至於余光中在評論朱自清的散文時，從其作品摘出了許多例句，余的評語有：「有時還有點歐化傾向」、「句法歐化而夾雜」、「乃歐化文法」、「……便是歐化」、「歐化得十分混雜」、「這樣子的歐化在朱文中常可見到」、「……正是歐化的現象」，³⁹都用於負面，皆屬「惡性歐化」。可以說，余光中對朱自清散文作品的批評主要集中在朱的惡性歐化上。余光中並說：

典型的中文句法，原很鬆動、自由，富於彈性，一旦歐化成為前飾句，就變得僵硬，死板、公式化了。⁴⁰

他指出古文絕少前飾句，並舉《史記》的句子：「廣為人長，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他說到了新文學早期作家的筆下，可能變出一個冗長的前飾句，如：「李廣是一個高個子的臂長如猿的天生善於射箭的英雄。」冗長繁瑣的前飾句，也可歸於惡性歐化一類。⁴¹

在中文歐化／西化問題上，余光中總結：

中文西化，雖然目前過多於功，未來恐怕也難將功折罪，但對白話文畢竟不是無功。犯罪的是「惡性西化」的「西而不化」。立功的是「善性西化」的「西而化之」以致「化西為中」。其間的差別，有時是絕對的，但往往是相對的。除了文筆極佳和文筆奇

³⁷ 余光中 Yu Kuangchung：〈徐志摩詩小論〉“Xu Zhimo shi xiaolun”，頁 15。

³⁸ 余光中 Yu Kuang-chung：〈從西而不化到西而化之〉“Cong xierbuhua dao xierhuazhi”，見其《分水嶺上》Fenshuiling shang，頁 165-167。

³⁹ 余光中 Yu Kuangchung：〈論朱自清的散文〉“Lun Zhu Ziqing de sanwen”，見其《青青邊愁》Qingqing bian chou，頁 237-241。

⁴⁰ 同上註，頁 242。

⁴¹ 英文前飾句的中譯影響，詳本文下節之（十）。

劣的少數例外，今日的作者大半出沒於三分善性七分惡性的西化地帶。⁴²

又表示：

……足見真通中文的人，體魄健全，內力深厚，所以西化得起。西化不起，西而不化的人，往往中文原就欠通。今日大學生筆下的中文，已經夠西化的了，西化且已過頭，他們所需要的，倒是「華化」。⁴³

一說今日的作者善性與惡性西化間，多屬三七開，一說今日大學生筆下已西化過頭而反需「華化」，足見中文書寫被英文或英文翻譯侵蝕的嚴重情形，他說：「中文通達的人面對無所不在的譯文體，最多感到眼界不清耳根不靜，頗為惱人。中文根柢原就薄弱的人，難逃這類譯文體的天羅地網，耳濡目染，久而習於其病，才真是無可救藥。」⁴⁴他說這番話的時間是1979年，距今三十多年，年輕一輩中文水準低落已是社會普遍的看法，雖然成因非一，不過，譯文體的直接、間接影響是其癥結，積弊日深，所以許多劣質的表達方式已有約定俗成之勢。他預測：「未來白話文的發展，一方面是少數人的『善性西化』愈演愈精進，一方面卻是多數人的『惡性西化』愈演愈墮落，勢不可遏。」⁴⁵這也是余光中或透過撰文、或經由演講，屢屢將中、英文表達方式以實例對比的緣故。他說：

魯迅、傅斯年等鼓吹中文西化，一大原因是當時的白話文尚未成熟，表達的能力尚頗有限，似應多乞外援。六十年後，白話文去蕪存菁，不但鍛鍊了口語，重估了文言，而且也吸收了外文，形成了一種多元新文體。今日的白話文已經相當成熟，不但不可再加西化，而且應該回過頭來檢討六十年間西化之得失，對「惡性西化」的各種病態，尤應注意革除。⁴⁶

⁴² 余光中 Yu Kuangchung：〈從西而不化到西而化之〉“Cong xierbuhua dao xierhuazhi”，見其《分水嶺上》*Fenshuiling shang*，頁162。

⁴³ 余光中 Yu Kuangchung：〈論中文之西化〉“Lun zhongwen zhi xihua”，見其《分水嶺上》*Fenshuiling shang*，頁123。

⁴⁴ 余光中 Yu Kuangchung：〈從西而不化到西而化之〉“Cong xierbuhua dao xierhuazhi”，見其《分水嶺上》*Fenshuiling shang*，頁146-147。

⁴⁵ 同上註，頁167。

⁴⁶ 余光中 Yu Kuangchung：〈論中文之西化〉“Lun zhongwen zhi xihua”，見其《分水嶺上》*Fenshuiling shang*，頁133。

這是對現代中文自五四時期以來的發展反思，在嘗試與修正的過程裡，現代中文已非青澀幼稚而難以自立的語文，可是，多數人「惡性西化」的狀況卻變本加厲。余光中認為確保中文的美感品質，其首要之務就是避免掉入「惡性西化」的窠臼，要革除「惡性西化」的各種病態，則須先具體揭示何謂「惡性西化」，並且有更好的表達方式取代，這方面，余光中也曾多所著墨。

四、惡性歐化的具體論例

中國文化受外來文化影響較大的兩次，一是古時佛教透過梵文翻譯，一是近代西方文化藉著英文翻譯；余光中認為：「梵文對中文的影響似乎止於詞彙，英文對中文的影響已經滲入文法。前者的作用止於表皮，後者的作用已達週身的關節。」⁴⁷梵文對中文的影響，他略帶含蓄，用了或然之詞「似乎」；英文對中文的影響則說得十分肯定，他認為滲入了有類週身關節的文法層次。不過，余光中說的「文法」，嚴格說來，並非只限狹義的文法，兼涉了相當於修辭意義的「文法」，並包含用詞。

余光中在不同文章中常論及中、英文表達方式之異，也總是舉出惡性歐化的實例，其中，〈從西而不化到西而化之〉、〈中文的常態與變態〉兩篇討論的面向比較廣泛，⁴⁸前一篇發表於1979年，後者則是1987年，但兩篇談及的惡性歐化現象不乏交集，相較之下，前一篇涉及的現象，廣於後者，因此，本文主要依據〈從西而不化到西而化之〉以歸納其說，而以〈中文的常態與變態〉增補，以求完整。

余光中提出的惡性歐化現象，這裡歸納其中常見的部分，用條例的方式顯示如下（各例在該書的見頁，逕註其後）：⁴⁹

⁴⁷ 余光中 Yu Kuangchung：〈論中文之西化〉“Lun zhongwen zhi xihua”，頁117。

⁴⁸ 余光中 Yu Kuangchung：〈從西而不化到西而化之〉“Cong xierbuhua dao xierhuazhi”，見其《分水嶺上》*Fenshuiling shang*，頁146-167；〈中文的常態與變態〉“Zhongwen de changtai yu biantai”，見其《從徐霞客到梵谷》*Cong Xu Xiake dao Fangu*，頁237-266。

⁴⁹ 余光中的著作極多，相關討論散見多篇，而提及的現象或同或異，頗為錯雜，本文僅選取其中較為常見的部分，有些零星意見則不納入，如：他說：「在兩個以上的一連串實字或虛字（介詞、副詞、代名詞等）之中，and 必然置於最後一個字之前。」他這裡說的是英文的寫法，但其固定的中譯形式也對現代中文產生了些微影響。類似的例子，本文就不另立項目論列。前引語出自余光中 Yu Kuangchung：〈虛實之間見功夫〉“Xushi zhijian jian gongfu”一文，見其《舉杯向天笑》*Jubei xiang tian xiao*，頁122。

- (一) 過度使用抽象名詞。如：「可讀性」、「侮辱性」等，說「這本小說的可讀性頗高」，不如說「這本小說很好看」，說「這傢伙說話太帶侮辱性了」不如說「這傢伙說話太無禮。」或「這傢伙說話太侮辱人了」。但是，透過翻譯而使用既久，像是「安全感」、「或然率」、「百分比」、「機動性」、「能見度」等說法已廣為使用，這類措詞往往讓人產生學術意味，卻實屬幻覺，余光中認為這類的演化應有幾個條件：好懂、簡潔、必須。⁵⁰他主張中文若有現成說法，就無須用歐化字眼。(頁 156)
- (二) 濫用代名詞。說「你這件新衣真漂亮，我真喜歡它」、「花蓮是臺灣東部的小城，它以海景壯美聞名」，兩句的「它」字不如省略。(頁 147-148)
- (三) 濫用複數標記的「們」字。中文歐化前，已有「爺們」、「姑娘們」等用法，但是「人們」卻是歐化影響下的產物，現成的說法有「大家」、「眾人」、「世人」、「人人」、「人群」等，不必用舶來的「人們」。另外，「觀眾」、「聽眾」已是「眾」，不必說「觀眾們」、「聽眾們」。⁵¹ (頁 155)
- (四) 過度使用連接詞「和」。說「李太太的父親年老和常生病」不如說「李太太的父親年老多病」或「李太太的父親年老而多病」。這是受了英文 and 影響所致，更婉轉曲折的「而」、「又」、「且」等連接詞反有良幣見逐之虞。(頁 148)
- (五) 過度使用「關於」、「有關」等介詞。說「關於王教授的為人，我們已經討論過了」、「你有關於老吳的消息嗎」，兩例的「關於」不如去除。這類的字眼如今用得頻繁，乃是受了 about、concerning、with regard to 等的影響。(頁 149)
- (六) 使用表示身份的生硬介詞。說「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們怎能不愛中國」，不如說「身為中國人，怎能不愛中國」，空泛的動詞於此指「作為」，不過，為求簡潔，修訂的句子裡，余光中把也刪除了量詞「一個」以及代詞「我們」。又如：說「緹縈已經盡了一個作為女兒的責任了」，不如說「緹縈已經盡了做女兒的責

⁵⁰ 嚴格說，他在這裡用的「必須」一詞，以「必要」替代較好。

⁵¹ 「聽眾」、「觀眾」之例，詳余光中 Yu Kuangchung〈中文的常態與變態〉“Zhongwen de changtai yu biantai”一文，見其《從徐霞客到梵谷》*Cong Xu Xiaoke dao Fangyu*，頁 246。

任了」，空泛的「作為」改成了「做」，並因單複數前後不相符，把量詞「一個」一併去除了。(頁 149)

- (七) 使用了空泛的動詞。這指以「萬用動詞+抽象名詞」的片語形式來表現，比如說「兄弟兩人爭論了一夜，最後還是哥哥作出讓步」，不如把當中的「作出」刪去，他如：說「作出主動」不如說「採取主動」，說「作出討論」不如說「加以討論」。「作出」這種空泛而萬能的動詞，余光中說類於歐威爾 (George Orwell) 所稱「文字的義肢」(verbal false limb)。⁵² (頁 151-152)
- (八) 不當使用動態助詞「著」。「著」在中文文法裡，表示「進行態」(或稱「持續態」)，歐化影響所及，原本「有」可以傳達的，往往說成「有著」，乃至變成「存在著」。
- (九) 不當使用冗贅的翻譯體，說「臺北市的交通有不少問題存在」，不如去掉「存在」，說「旅伴之間總難免會有摩擦的發生」，不如去掉「的發生」，用一個「有」字就已足夠。(頁 152)
- (十) 使用英文後置形容詞子句的變形。余光中說：「英文好用形容詞子句，但在文法上往往置於受形容的名詞之後，成為追敘。中文格於文法，如要保留這種形容詞子句的形式，常要把它放在受形容的名詞之前，顛巍巍地，像頂大而無當的高帽子。」如：「獻身於革命的壯烈大業的他，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不如說「他獻身於革命的壯烈大業，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頁 158)⁵³
- (十一) 使用前飾形容詞而使形容詞與動詞相隔太遠。說「我絕不原諒任何事先沒有得到我的同意就擅自引述我的話的人」，不如說「任何人事先沒有得到我同意就擅自引述我的話，我絕不原諒」，余光中修訂的文字，若更求清暢，可再調整為「誰未經同意就擅自引述我的話，我絕不原諒」，甚至改成「誰擅自引述我的話，我絕不原諒」，因為「擅自」就隱含「未經同意」之意。(頁 160)

⁵² 他在〈中文的常態與變態〉也引述了同一說法，並說此類的動詞，西方學者稱之為「弱動詞」(weak verb)，見其《從徐霞客到梵谷》*Cong Xu Xiake dao Fangu*，頁 241-242。

⁵³ 在〈論的的不休〉一文，余光中也提到：「……後飾語到中文裡便成了前飾語，不但堆砌得累贅、生硬，而且平空添出一大批的『的化語』來。」他舉了某英漢字典將 I know a girl whose mother is a pianist. 譯成了「我認識其母親為鋼琴家的一個女孩。」余光中說不如化成短句而成「我認識一個女孩，她母親是鋼琴家。」見其《藍墨水的下游》*Lan moshui de xiayou*，頁 86-87。

- (十二) 使用英文的副詞形式。如：「老師苦口婆心地勸了他半天」、「大家苦中作樂地竟然大唱其民謠」，兩句的「地」字不如以逗點取代，說成「老師苦口婆心，勸了他半天」、「大家苦中作樂，竟然大唱其民謠」。⁵⁴
- (十三) 使用英文副詞子句的形式。這裡指的是「當……之後」、「當……的時候」一類的形式，如：說「當你把稿子寫好了之後，立刻用掛號信寄給編輯」，不如說「你稿子一寫好，立刻用掛號信寄給編輯」。(頁 159)
- (十四) 使用「之一」、「一定的」，狀似精密而實屬朦朧。如：說「李白是中國最偉大的詩人之一」，不如說「李白是中國極偉大的詩人」；說「陳先生在針灸的醫術上有一定的貢獻」，「一定的貢獻」不如說「略有貢獻」、「頗有貢獻」、「甚有貢獻」、「極有貢獻」、「最有貢獻」。(頁 153)
- (十五) 濫用被動語氣。如：說「這一項提案已經被執行委員會多次地討論，而且被通過了」，不如說「這一項提案執行委員會已經討論多次，而且通過了」，說「那名間諜被指示在火車站的月臺上等候他」，不如說「那名間諜奉命在火車站的月臺上等候他」。余光中也指出：在「被」、「經」、「為」、「受」、「遭」、「挨」、「給」、「教」、「讓」、「任」等，也可以表示被動。(頁 156-158)
- (十六) 過度使用「的」字。在前述現象之外，余光中的〈論的的不休〉專論了現代中文裡頻繁使用「的」字的狀況，這並非都能歸因於惡性歐化，但至少部分相關，何其芳的句子：「白色的鴨也似有一點煩躁了，有不潔的顏色的都市的河溝裡傳出它們焦急的叫聲。」余光中認為「的」字太多了，並說：「這種稀釋的『的化語』在白話的舊小說裡並不常見，究竟它是西化促成的現象，還是它倒過來促成了西化，還是兩者互為因果，應該有人深入去研究，我覺得英文字典的編譯者，似乎要負一部分責任。」⁵⁵他的意思是指英文形容詞中譯時，

⁵⁴ 此例詳余光中 Yu Kuangchung 〈中文的常態與變態〉“Zhongwen de changtai yu biantai”，見其《從徐霞客到梵谷》*Cong Xu Xiake dao Fangu*，頁 253-254。

⁵⁵ 余光中 Yu Kuangchung: 〈論的的不休〉“Lun de de bu xiu”，見其《藍墨水的下游》*Lan moshui*

形式常表以「～的」，如：美麗的、美觀的，美好的，長久洗腦之下，就滲進了中文表達。換言之，現代中文出現大量「的」字，英文翻譯是不是元凶，尚待探討，至少推波助瀾了。

對中文惡性歐化的現象，余光中既敏感又在意，2000年，他評鍾怡雯的作品，說：「鍾怡雯的語言之美兼具流暢與細緻，大體上生動而天然，並不怎麼刻意求工。說她是一流的散文家，該無異議。她的藝術，到了《垂釣睡眠》火候已經九分有餘了，但要『純青』，似乎仍需加煉。」而他認為未及爐火純青就是仍見「西化之病」，比如：鍾的作品寫道：「他們該試一試永續不眠的夜色，一如被綁在高加索山上，日日夜夜被鷲鷹啄食內臟的普羅米修斯，承受不斷被撕裂且永無結局的痛苦。」余光中認為不如寫成：「他們一試永續不眠的夜色，一如普羅米修斯被綁在高加索山上，日日夜夜被鷲鷹啄食內臟，承受不斷被撕裂的痛苦。」這主要就是本節前面所列的第九類例子；又，鍾的作品寫道：「那些傷痛是出走的睡眠留給我的紀念，同時提醒我它的重要性。」余光中認為末句宜改為：「同時提醒我它有多重要。」這則是本節前面所列的第一類例子。⁵⁶這既是出自中、英文比較的視野，也是出自詩人對用詞措語的考究——詩歌這一文類向來公認是最精緻的語言藝術。將此運用到詩歌外的語文表達，或許在一般人看來是吹毛求疵，不必計較；唯從對語文的審美立場出發，則屬精益求精的工夫，應該講求，乃至錙銖必較。

五、余光中早期作品裡的惡性歐化

1967年，余光中近四十歲時，曾說：「……與其生吞活剝數種文字，還不如將本國的文字鍛鍊的至精至純。」又說：「文字，是文學這一行的基本工具。連工具都拿不穩，手藝可想而知。」⁵⁷該文見於次年出版的《望鄉的牧神》一書，原文針對批評家而來，更不用說文字要求對作家的重要了。這兩段文字和他評析鍾怡雯作品的說法併讀，兩者有似一把尺和測量對象

de xiayou，頁 78-84。

⁵⁶ 余光中 Yu Kuangchung:〈狸奴的腹語——讀鍾怡雯的散文〉“Linu de fuyu: du Zhong Yiwen de sanwen”，見其《舉杯向天笑》*Jubei xiang tian xiao*，頁 171-173。

⁵⁷ 余光中 Yu Kuangchung:〈從「二房東」說起〉“Cong'erfangdong'shuo qi”，見其《望鄉的牧神》*Wangxiang de mushen*，頁 137、138。

間的關係。但是，若檢視余光中《望鄉的牧神》所收諸文，不難發現：他後來所詬病的中文歐化，於自己筆下也屢屢出現。

這裡就從他《望鄉的牧神》一書舉出幾類惡性歐化的實例（各例在該書的見頁，逕註其後）：

- （一）「過度使用抽象名詞」部分，余光中早年用得頻繁，如：「獨創性」（頁 74）、「持久性」（頁 77）、「博大性」（頁 78）、「超越性」（頁 82）、「相反性」（頁 112）、「緊張性」（頁 114）、「暗示性」（頁 131）、「永恆性」（頁 153）、「普遍性」（頁 153）、「綜合性」（頁 157）、「可視性」（頁 160）、「可聽性」（頁 160）、「繪畫性」（頁 161）、「音樂性」（頁 161）、「可能性」（頁 185）、「純粹性」（頁 237）、「偉大性」（頁 267）、「自傳性」（頁 275）。這類詞彙用得相當多，以上所舉各詞，多半不止一次出現。
- （二）「濫用代名詞」，如：「真正的傑作非但歷久不滅，而且因後代的作品不斷引用它，影射它，學習它，而愈益光大」（頁 77）。這類例子於《望鄉的牧神》僅一見，句中的三個「它」字在中文裡都可以省略不說。
- （三）「濫用複數標記的『們』字」，如：「岩石們」（頁 10）、「批評家們」（頁 87）、「二房東們」（頁 91）、「詩人們」（頁 199）、「劍橋的女士們」（頁 259）、「大師們」（頁 263），其中，不乏出現多次的。
- （四）「不當使用動態助詞『著』」，於該書僅見一例：「可是批評家們仍是糾纏著他」（頁 141），此例的「著」字部分歐化意味不重，因為「動詞+著」的表述形式，中文本來就有，如「攪拌著」、「配戴著」等。不過，前面的例句從整體看，則歐化痕跡明顯，「仍是糾纏著他」若去掉「是」字，改成「仍糾纏著他」就比較好，也無妨再刪「著」字而成為「仍糾纏他」。
- （五）「不當使用冗贅的翻譯體」，如：「對後來的作者發生很深的影響」（頁 73）、「壓根就不知道有這麼一本書存在」（頁 179）、「中國作家對於另一個世界的存在，既不完全肯定，也不完全否定」（頁 210）、「一個新天才的出現」（頁 267），分別可以說成：「對後來的作者影響很深」、「壓根就不知道有這麼一本書」（或「壓

根就不知道這麼一本書」)、「有沒有另一個世界，中國作家既不完全肯定，也不完全否定」、「出現一個新天才」。

- (六) 「使用英文後置形容詞子句的變形」，如：「她是一個胸脯寬闊，眸光親切的婦人」(頁 47)、「篤信現代主義而且將那種經驗真實並完美地表現為詩的作者，實值得我們尊敬的」(頁 168)、「才高氣盛，活力過人的龐德」(頁 272)。
- (七) 「使用英文的副詞形式」，主要反映在使用「地」字方面，如：「我們在桑德堡的無韻詩裡無聲地前進」(頁 7)、「但他的思想卻因此加倍地突出」(頁 74)，但這類表達方式在閱聽上，不會有強烈的歐化感，或是因為中文本來就有「慢慢地走」、「非常地漂亮」一類的說法，只不過用得不像當代那麼頻繁，而且即使不必然否定這種說法，往往也可以因精簡而更好，前述兩個例子：「在桑德堡的無韻詩裡無聲地前進」、「但他的思想卻因此加倍地突出」，其「地」字皆可省去。
- (八) 「使用狀似精密而實屬朦朧的『之一』」，如：「他仍是最好的抒情詩人之一」(頁 80)、「史班德一直是最活躍的詩人之一」(頁 80)、「這是葉慈最直率而大膽的短詩之一」(頁 116)、「它不但是英國現代文學中最好的寓言體之一」(頁 179)、「……而成為最不善自我宣傳但事實上是最早也是最嚴肅的反共作家之一」(頁 180)、「目前，這個島上的現代詩，最嚴重的病態之一，便是意象上毫無節制的鋪張」(頁 198)、「中國的古典文學，是世界上最古老也是最年輕的文學之一」(頁 183)、「方莘是最有才的試驗者之一」(頁 237)、「方莘是現代詩人中最接近繪畫和音樂的作者之一，這一點也可說明，何以他也是現代詩人中最精鍊最純粹的作者之一」(頁 248)、「『雨』一首不但是這一輯中最完美迷人的版畫，也是現代詩中罕見的小型傑作之一」(頁 248-249)，這些例子都是英文「one of the+最高級～」用法的中文直譯形式。
- (九) 「濫用被動語氣」，如：「……註定了是不能被囿於某一理論的範圍的」(頁 272)，此類只見一例，問題較輕，而該句歐化不僅在被動語氣，避免凡冗，可修改成「……註定不能囿於某一理論」。

(十)「過度使用『的』字」，如：「……和十幾英畝的藍被搗成鼎沸的白的那種混亂」(頁 31)、「我的不太願意涉及這個標準」(頁 78)、「他的新世界的秩序」(頁 111)。

以上是余光中《望鄉的牧神》一書中的惡性歐化實例，同書有惡性歐化嫌疑的，還包括「一」的頻繁出現，其中可能不乏英文不定冠詞的殘影，如：「一個」(頁 125)、「一種」(頁 126)、「一位」(頁 165)，因待逐一細辨，本文就不贅論。該書收錄了他在 1966 至 1968 年間的文字，其中一篇文章裡，他說：「純口語的用字，遣詞，與句法，比較單調，淺顯，而狹窄。適度地加入文言和歐化的詞句或語氣，可以大大增進節奏的彈性和變化。」⁵⁸他同一時期的作品出現了歐化的元素，是否即是刻意的？或者，刻意的比例有多少？不得而知，這裡引述的話語，他針對的是現代詩，是否各文類一體適用？此亦有待追索。然而，這段時間的文字表現明顯異於他後來所寫的，怎麼看待這個現象？余光中 2004 年寫的〈成語和格言〉裡說道：

早期我的散文兼容英文句法，單行多於駢行，較少四字成語或四字句型。後期則有意「去英文化」，不但字句較短，而且駢散交錯，因此四字字型增多。評論我散文的學者，不少人肯定我的後期而質疑我的早期，恐怕這也是一大原因。早期的我，像大鬧天宮的孫悟空；後期的我，已成為唐僧的徒弟了。早期的飛揚跋扈，不知為誰而雄。後期似乎「雅馴」多了，卻也太「馴」了吧。⁵⁹

他的話雖指向四字成語與句型，仍可看出其反思與轉變非僅如此，後期有意「去英文化」云云，自可解釋何以他早期作品不乏惡性的歐化色彩，而後期不但褪掉了，而且或訴諸筆端，或藉由訪談、演講，一再強調避免惡性歐化的影響。除此之外，1956 年，他翻譯了伊爾文·史東 (Irving Stone) 《梵谷傳》(Lust for Life)，印行二十多年後，他逐頁修改，而於 1978 年出版新譯版，調整幅度極大，主要是用相對純粹的措辭取代「洋腔洋調」，這種自我挑戰，正是余光中對現代中文深切體悟的明徵。他長期在寫作、思考中不斷摸索，找出了許多具體問題；他發現「中文正由簡潔淪為繁瑣，

⁵⁸ 余光中 Yu Kuangchung:〈現代詩的名與實〉“Xiandaishi de ming yu shi”，見其《望鄉的牧神》Wangxiang de mushen，頁 164。

⁵⁹ 余光中 Yu Kuangchung:〈成語和格言〉“Chengyu he geyan”，見其《舉杯向天笑》Jubei xiang tian xiao，頁 58-59。

雅正淪為庸俗」，感喟道：「美麗的中文，我們這民族最悠久也是最珍貴的一筆遺產，正遭受日漸嚴重的扭曲與污染。」⁶⁰於是積極提出筆耕心耘過程中的相關體認，期望改變現代大眾的中文，這已超越了作家個人的創作領域而具有公民關懷的性質。如余光中憂心中文衰落者，不乏其人，但找到病因、開出藥方並示人以法的，數他貢獻最大，而這些，主要啟自於他對中、英文的比較視野。

六、餘論

本文曾引述余光中所說：「六十年後，白話文去蕪存菁，不但鍛鍊了口語，重估了文言，而且也吸收了外文，形成了一種多元新文體。」⁶¹他認為外文與口語、文言一樣是現代中文的元素，皆可豐富現代中文。他態度開放，但強調必須揀擇，這也是他一再呼籲要避免惡性歐化的原因。

多年前，余光中開始關注這個問題時，媒體猶限於廣播電視、報章雜誌，今天新興的網路平臺對大眾使用語文的影響卻更大。或許有人認為語文原即約定俗成，應該任其發展，不必干涉，可是，不顧「質」而只看「量」，不單遣詞用字的標準將發生問題，多少世代累積的許多美感遺產會迅速流失，可以試著想像僅以 Google 等搜尋引擎取代所有辭典的景況，搜尋引擎的看家本領是快速搜尋與統計，以此為滿足，很容易造成以量代質、劣幣驅逐良幣的效應。語文並不僅僅是溝通工具，一個人的語文樣貌即他內在世界的樣貌，訊息的形式本身就潛蘊了某種內容。

固然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掀起了全球學習中文的熱潮，英文仍是當今最強勢的語文，其強勢不只在非母語的學習者眾多，也反映在許多文本必須從英文翻譯；因此，原文以及翻譯體都牽動了中文、影響了中文的使用習慣。今天，就現代中文而言，英文老師的影響可能大過國文老師，翻譯作品的陶塑力量可能超過中文作品，英漢辭典的潛移默化也可能勝過國語辭典；從文化立場來看，這不是道德命題中的「可惡」，而是審美意義上的「可惜」。余光中一篇篇的論析切中了問題的癥結，在臺灣並參與了「搶救國文教育聯盟」，他的〈在外語與方言之間〉已成為該聯盟的行動宣言，其中寫

⁶⁰ 余光中 Yu Kuangchung：〈翻譯之教育與反教育〉“Fanyi zhi jiaoyu yu fanjiaoyu”，見其《舉杯向天笑》*Jubei xiang tian xiao*，頁 117。

⁶¹ 余光中 Yu Kuangchung：〈論中文之西化〉“Lun zhongwen zhi xihua”，見其《分水嶺上》*Fenshuiling shang*，頁 133。

道：「文章通不通，只要看清順的作品便可；但是美不美，卻必須以千古的典範為準則。」⁶²那麼，完整的中文素養既要靠現代作品，也要仰賴古典佳作，這都是中文系責無旁貸的工作。可是，如何避免劣質翻譯體的侵蝕，則必須落實在外文系的中文教育。忽略這一點，「搶救國文教育聯盟」很容易狹隘地只顧搶救國文老師的國文課，誰管外文系學生的中文素養以及翻譯課呢？余光中說：

多年以前，有人提議不如把中、外文系合併為文學系。以今日眼光看來，也許可把中、外文系合併，再重新分家成為文學系與語言學系。這當然不失為令人神往的理想，可是貫通中外，甚至僅兼窺中英的「通人」委實難求，一般學者仍然不免為「文字障」所限。所謂文字障，不獨指英文之於一般中文系學者，其實中國古籍之於一般外文系學者何嘗不然？⁶³

他的想法有道理，卻難實現。從學校教育看，現代中文出現的許多問題恰恰出於國文與英文兩門課程間的縫隙，而在網路、媒體的大浪下，中文的「通不通」與「美不美」已成次要，臉書貼文、洗版、再貼文，頻繁新陳代謝，簡訊來回傳送、刪除，也迅速循環，這樣的實際情況使得語文在多數情境已屬瞬間消費的物件，出以文化角度，似不宜袖手，即使無法力挽狂瀾，至少宜對優質中文進行某種程度的「保育」。余光中曾慨乎言之：「如果教育制度和大眾傳播的方式任其發展，中文的式微是永無止境，萬劫難復的。」⁶⁴從現況看，雖非注定如此，卻也不是危言聳聽。

【責任編校：王睿含、蔣巧伶】

⁶² 見余光中 Yu Kuangchung：〈在外語與方言之間〉“Zai waiyu yu fangyan zhijian”（「搶救國文教育聯盟」行動宣言），收錄於李素真 Li Suzhen 策劃主編：《自豪與自幸——二十堂名家的國文課》Zihao yu zixing: ershi tang mingjia de guowen ke，頁4。

⁶³ 余光中 Yu Kuangchung：〈雞犬相聞〉“Jiquan xiangwen”，見其《憑一張地圖》Ping yizhang ditu（臺北[Taipei]：九歌[Jiuge]，1989年），頁56。

⁶⁴ 余光中 Yu Kuangchung：〈哀中文之式微〉“Ai zhongwen zhi shiwei”，見其《輕輕邊愁》Qingqing bian chou，頁93。

主要參考書目

- 余光中 Yu Kuangchung :《望鄉的牧神》*Wangxiang de mushen* ,臺北 Taipei :純文學 Chunwenxue , 1975 年。
- :《焚鶴人》*Fenhe ren* ,臺北 Taipei :純文學 Chunwenxue , 1981 年。
- :《逍遙遊》*Xiaoyao you* ,臺北 Taipei :大林出版社 Dalin chubanshe , 1982 年。
- :《憑一張地圖》*Ping yizhang ditu* ,臺北 Taipei :九歌 Jiuge , 1989 年。
- :《從徐霞客到梵谷》*Cong Xu Xiake dao Fangu* ,臺北 Taipei :九歌 Jiuge , 1994 年。
- :《藍墨水的下游》*Lan moshui de xiayou* ,臺北 Taipei :九歌 Jiuge , 1998 年。
- :《隔水呼渡》*Geshui hu du* ,臺北 Taipei :九歌 Jiuge , 2000 年。
- :《舉杯向天笑》*Jubei xiang tian xiao* ,臺北 Taipei :九歌 Jiuge , 2008 年。
- :《分水嶺上》*Fenshuiling shang* ,臺北 Taipei :九歌 Jiuge , 2009 年。
- :《青青邊愁》*Qingqing bian chou* ,臺北 Taipei :九歌 Jiuge , 2010 年。
- 李素真 Li Suzhen 主編 :《自豪與自幸——二十堂名家的國文課》*Zihao yu zixing: ershi tang mingjia de guowen ke* ,臺北 Taipei :商周出版 Shangzhou chuban , 2005 年。
- 陳望道 Chen Wangdao :《修辭學發凡》*Xiucixue fafan* ,上海 Shanghai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 2006 年。

審查意見摘要

第一位審查人：

本文有清楚的問題意識，論述條理分明，架構穩妥。優點有二：一是立場公允，對問題的討論沒有預設立場，闡述過程中對正反意見都能適切客觀呈現；其次，在說明余光中針對五四以來許多惡性歐化文例的批評之後，作者還從余光中自身早期作品中也存在惡性歐化色彩的現象來加以探討，指出他的文字也不乏「英文化」的「洋腔洋調」，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兩相對照，對現代中文應該如何去蕪存菁、簡潔雅正表達有了令人更為深入的思索。

作者由此發展出對「搶救國文教育聯盟」的一些看法，確實能貼近時代脈動，使本文在學術價值之外，也有了現實意義。

第二位審查人：

本文通過余光中有關現代中文的論述與實踐，論他之於中文歐化現象的看法；並且評述他早年散文的歐化現象，證明他的後期見解是在一個動態思考與實踐歷程中形成的。全文使用余光中 20 幾篇有關現代中文的文章，出自七、八部散文／評論集；時間的跨度很長，大約從 1960 年代迄今。整體來看，係屬評論的評論，這樣的論文，以歸納為主，必得綱舉目張；但論證推理也很重要。本文做得很好，行文亦極流暢。